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四八期 ——
(二〇〇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307c)

| | | |
|--------|-------------------|------------|
| 【峥嵘岁月】 | 波澜乍起 | 徐海亮 |
| 【史海钩沉】 | 三审王光美 | 清华大学《井冈山》报 |
| 【当事者说】 | 这回真要和你分别了 | 王光美 |
| 【文献资料】 | 九大毛泽东主持会议记录稿 (之一) |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候 5c 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峥嵘岁月】

波澜乍起

• 徐海亮 •

(一)

1966年6月12日上午，省委工作组的李凤翔组长，在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动员开展文化大革命，传达了毛泽东主席最近的一个批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集中在院体育馆里的三千多听众，轰地一下站了起来，鼓掌，发出了长时间的“呵…呵…”的欢呼声。

一种与天庭豁然贯通的神圣感，抽紧了我的心，我的眼角湿润了，而且感觉到，周围好些同学的眼边也挂着泪花。

两、三个月后，我一次次回忆起工作组进驻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第一天的场景，努力去揣测当时还没有出现“左派”或“右派”，“革命群众”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野的老师、同学的最初心理状态。我相信，在那一天，绝大多数在场的欢呼者，都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看作是毛主席、共产党的人，自认为应该是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尽管也有些人未必能这么坦然和

轻松。

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头一年，我22岁，在武汉水院念四年级。我的同学大多在这个年龄上下，完全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一代学生。那时大家很喜欢一首赞颂雷锋的诗：“你只有二十二岁；不对，不对……二十二岁是什么样的年龄啊？七分热情，三分幼稚……”。凭着激情和幼稚，我和我的同龄一代，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这场30年后、或许40年后人们还不得不议论的政治大动荡。说不自觉，是因为我在6月，甚至在1966年，并不可能知道这场革命最终要作什么，会出现些什么。不过1966年春天报刊上频频发表的史学、文艺战线大批判文章，持续了两个月的批判“三家村”，使刚刚从“四清”第一线归来的师生，隐隐感到一场政治斗争的来临。特别是6月3日广播了党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新市委指派的北大工作组已接管北大党委权力。有同学在悄悄议论，是不是彭真出了问题，北大出了问题。一年级的游华生同学，6月2号晚饭前就首先贴出响应北大的大字报，批评院党委对文革运动缺乏应有的热情。实际上，持续已3年的中苏公开论战，早已为这场文化大革命形成了种种理论、观点，乃至后来红卫兵的文风。1965年春，“二十三条”在学校传达，令人特别注意到“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新概念。后来参加农村“四清”运动，我们虽然没有与任何想象的走资派交锋，但阶级斗争的弦已绷紧，我们学了撇开基层组织，由工作组发动群众来揭发干部的办法。从农村回来，本来我们已进入专业课学习阶段，但没法平静下来，回到学校后，我去图书馆把下乡期间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的重要文章补阅了，作了笔记。1966年1月21日，我在一则补阅日记上写下：“‘四清’之中发表了好几篇文化思想战线上的重要文章，都是谈的政治。回来后得认真学习”。我也觉得中国之大，似也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3月6日，给一位远在边疆、正在社教中的老校友写信，说“以往的高校和社会斗争有极大程度的脱离，这种脱离是资产阶级的，是人为的。现在正在变，变得很好，大快人心”。读了回忆《我的大学生活》之（一）（二）（三），都会明白，实际上我们的党与国家、我们的学校、（至少）我自己，思想与行为都为迎接这场运动，准备了数年。

工作组进驻水院的7天，是不眠的一周。水院像一堆乾柴，轰然起火；沿校区大道匆忙树立的大字报栏，贴满了大字报。被意识形态斗争热浪和既单调——（但）又丰富的学生生活烘焙了数年的乾柴，终于达到了燃点。同学们的狂热、兴奋程度，超过了1958年大炼钢铁时期。那些天，没有什么派不派，武昌的工人给大学生运来了白纸和墨汁，我们的洗脸盆盛满了浆糊；人与人也好像一下子亲近了很多。感情冲动，思潮澎湃，激情与热泪相融。公正的说，学生们当时绝对是信任湖北省委的，也拥护派工作组到学校指导运动，因为我们自己也刚刚做过工作组员；尽管李组长仅仅是民族学院的一位处级干部，但他代表了省委来领导运动，不少同学去找工作组，去述说党委领导运动的不得力，去述说自己的怀疑。尽管院党委没有靠边，但已有人写出大字报，说张院长、张书记、张副院长是“张家村”，主抓教学的张副院长，自然成了“反动学术权威”；特别是党委宣传部胡部长，鉴于他的工作性质敏感，多年来在干部、学生中，又颇有不良印象和一些出格的言论，他自然成了众矢之的。当时学生并不真了解学校的历史、人事内情，所列举的领导罪状，无非都是“抵制毛泽东教育思想”、“抵制文化革命”之类，许多问题确实是捕风捉影。而我个人心中的文化革命，在1966年的6月，充其量是一场教育革命。

有的大字报无限上纲，有的出现了谩骂与人身攻击，动不动把人名打上红叉叉……党委在公开场合，什么也讲不出来。而且有口也似难讲清白。

当然，在狂热与激昂之中，同学们也有徘徊和内心的冲突，一个一年级同学悄悄找我聊天，告诉我他很矛盾，好像自己的父母亲被批判了似的（他父亲是西安的一个厂长，该同学后来倒是一个坚定的造反派成员）；而且不理解为什么老干部会犯错误。我说我很理解他的苦闷和担忧，但我可以批判他们，也理解为什么老干部跟不上这次革命的形势，会有人犯错误。当时，同学

们奇怪地发现各系党政干部按兵不动，态度暧昧，甚至阻碍学生起来，部份学生干部跟在领导后面，冷言冷语，从而疑窦顿生。有的系低年级同学与辅导员发生激烈争执。个别政工干部流露出要警惕坏人破坏的言语，学生中也流传出有左、中、右秘密排队之事，激起群众强烈不满。好几次，在一些公共场所，如食堂、宿舍楼外空地，学生自发聚会、集会、争辩、述说。一些同乡、熟人，特别是文艺、体育积极分子等活跃分子在走动，原始状态的串联，已在系际、年级间出现，当时还没有“串联”这个名词；原始的串联被斥之为上窜下跳。

6月14号我们系在宿舍阳台开会，党总支寇书记承认他有些怕，有人问“怕啥”？他支吾不出，我忍不住噙出一句“怕群众吧，为什么呢”？同学们都笑而起哄起来。会下我就写出大字报，希望书记不要象50年代毛主席批评的农村社会主义高潮里的小脚女人，应该站出来领导学生。几个月后，班支书告诉我，那天会后下去，寇书记还禁不住发抖，还喃喃说“徐海亮终于跳出来了”！一些不善言行的人，正在思考，把激进分子视为“四清”中所谓的“勇敢分子”，去打听他们的出身、表现与动机。包括我也以正统思维在这么观察、担心。6月17日、18日，出现了反复。以“工人要说话”名义出现了反击大字报，院广播站反复播送“反击别有用心的一小撮人”的声明，有人慌着撕去已贴出的大字报，有人马上涂去大字报上已签上的名字，有人哭泣、开始作检讨。张弗承书记开会向处级干部分析形势，说1966年是“1957年加1958年的形势”，文化革命是“一场新的反右派斗争”。当时，大家完全不知道这是张书记从中南局宣传文教口会议带回来的精神（5月9日，陶铸在中南局省市宣传部长和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上部署文化教育界的运动。5月中旬张书记从广州开会回来，紧接着省委也部署传达了中南局的精神）。坚定分子对这一提法嗤之以鼻，认为1966年就是1966年，是毛主席领导的革命，是为了反对走资派。我从1962年开始关心国际共运和国内问题，当年4、5月又从图书馆翻阅了1957年社论、大字报文献资料，自然也决不同意文化革命就是在知识界来一场新的反右运动的认识。恰好那几天广播了南京大学的消息，批判校长匡亚明压制学生，敏感的学生反对把紧跟院党委、保卫院党委和紧跟保卫毛主席、党中央、湖北省委并提，即反对提“四个紧跟”。“17—18号事件”这样就过去了，但学生中的分裂从此开始。19号是一个星期天，全院自动放假一天；不少人到华中工学院、武汉测绘学院、湖北大学、湖北医学院，从自己的老同学或老乡那里了解其他学校情况，这大概是第一次的校际串联。运动紧张地发展，形势还没有出现一边倒的情况。激进者对工作组开始不满，去省委反映情况，未得到满意的答复，其中一个三年级同学，叫任乾健的，便自己买票去北京找中央文革接待站反映情况，并在学校扬言，要去找王任重。

保卫科秘密监视群众，将在群众中“反击右派”的传闻不翼而飞。我隐隐感到压力的存在。早在5月份，我借用系文体部长在楼梯下的狭小洗印暗房，在熄灯后利用红灯起草批判“三家村”的文稿，居然被汇报到党委宣传部，部里一个认识我的干事，出于好意悄悄要同学收回钥匙，同学又困惑不解地告诉了我。我敏感地意识到院里在监视我，心里好笑。5个月后，真相大白，原来从张书记参加中南区文教系统的文革动员会回来，就布置了在师生中排队、整理资料的工作。工作组进院伊始，宣传部胡部长就汇报了所谓左、中、右的形势，其中也包括我。到6月底7月初，敏感的同学都意识到，所谓的反扑——反击“右派”几乎不可避免。我将一幅非常喜欢的“欧阳海舍身救火车”的4开张版画，托同学送给院广播台的专职台长，一个曾经关系很好的专业军人，而且在画上写下“敬赠吴金海同志，愿我们以欧阳海烈士的话共勉：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了我，我相信共产主义事业一定会胜利……”。看了电影《革命自有后来人》，我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要向欧阳海同志学习，‘即使有一天，这个世界上没有了我，我也仍然衷心地相信：共产主义的理想必然胜利，一定会有更多更多觉醒了的人为它战斗’。为了历史列车的畅行，即使有生命危险，也要冲着障碍物上……”。又写下社会主义革命也还是有生命牺牲的，要有思想准备，如果有一天需要牺牲，要相信革命自有后来人。（几十年过去，我见到《欧阳海之歌》的作者金敬迈，说不要轻易戏言当年写了这部作品；历史是严肃的，至今我还不es敢多想欧阳海那“最后四秒钟”与他血染的日记，一想“为事业献身”就得伤感，也许正是金

书的出版，成为另一个契机，把我们这欧阳海的同一代人送上了自认为舍身以取义的中国文化革命）。

7月10日，省委加强了运动指导，派来了以省委副秘书长刘真为首的工作队。学生中传开，他是当年武汉大学斗争中的工作队长，后留下当校长，是当然的左派，八级干部。我依然天真地私下想，大概他可以镇住院党委了。

只有极少数干部知道，工作队进驻，是来执行省委关于在水电学院反击右派指示的。干部、师生中的“右派”，早在5月中旬，就已按既定精神，暗中确定。到了10月份，学生才从转抄、油印出来的一份文件中，知道省委第一书记——也是中南局书记的王任重，有一个“七·三批示”，说武汉地区文化革命形势很好；有左、右派争夺领导权的学校，如水电学院，“差不多一切牛鬼蛇神都出来了。毛主席教导我们：引蛇出洞，好打”；“有条件就把左派队伍组织好……抓住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彻底斗倒斗臭……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水院可以把最坏的学生揪出来，集中的斗，打掉他们的气焰”。省委书记是在武汉大学学生中深孚众望的秀才书记，大学生听过他的形势报告，读过他的好些文章，也听说毛主席很欣赏他；我考大学的作文“说不怕鬼”也是受他类似文章启发而一挥而就的。这时，他已到京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副组长。我那时想不到水利学院的事是他一手关照的，更不至于想到用一半光阴研读马列的自己，就会是只最坏的“出头鸟”。

7月14日傍晚，我去看大字报路上巧遇政治经济学的刘老师、党史课的陈老师，简单寒暄后即走开，我不经意回了一下头，他俩正贴耳说什么，几乎同时，陈老师也不经意回头看我，两眼居然射出时尚的阶级斗争的仇恨眼光。这就是二年级时在7个班的大课上公开点名批评我“一个中国人居然用英文记中共党史笔记”的那位讲师，也是自此30多年后，在全国性马列教育学术会议上对我的一个亲戚说“你认识徐海亮？他用英语记中共党史笔记呵”的那位退休老教授。

那天晚上露宿阳台，与低年级同学议论了沉闷的运动形势，再也无法入睡。对面宿舍楼的一些公用房间，居然通宵有人写大字报，什么事这样忙呢？我后来才听与会者说，正是当晚，各教研组、各班的“左派积极分子”，正集中在图书馆四楼开秘密会议，工作队和张院长做了反击的动员。会后，部份人回去抄写业已草就改就的大字报稿，其他人通宵留在大会议室不能外出，以免走漏风声。

7月15日，公开点名批判斗争学生、老师，有组织地炮制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地出现在校园中，覆盖了全部席棚。记得第一名受批判的就是上京去找王任重的任乾健同学（6382班，他后来在湖南工作）。另一名是6344班的团支书郭明正，据说他泄露了系“左派”碰头会秘密，又在全班吃西瓜时（“文革”中学校仍每日发冷饮，有时是发西瓜），持切瓜菜刀威胁不同观点的同学，“杀人未遂”，不几天，就以“任、郭反党集团”首谋“持刀杀人”罪名将他正式逮捕。另一位就是我，据说是1962年就组织了反革命集团，向毛主席上“万言书”，要篡党篡政，想当总理；持刀破坏文化革命，在二系组织了系列黑会，有“徐、晏反党集团”。还有一个同学的罪名现已记不起来，大致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极端自由主义”。后来才知道，我们4人是院党委向工作队汇报，经省委正式批准公开点名的。尽管工作队原意似乎是要控制打击面，只枪打“出头鸟”即可，但不出一周，全院在各级公开点名批斗老师、学生已逾百人。一位据说是57年漏网右派、名利思想严重、自称要超过爱因斯坦的老师罗守琳跳了长江大桥（我的物理老师）。一位从苏联留学归来的张庭英自杀；批判他的罪状恰恰是他向党组织交心，清理自己对苏共中央存在的“模糊认识”。一学生自杀未遂，据说吓得神经分裂了……我实际处于台风眼中，外界信息不通，见识“反击狂飙”不足，对毛泽东后来怒斥的广泛的“白色恐怖”似乎还没有同学们深知；一些事情时至今日，还常被当年的“右派”、“左派”同学披露……都

是快60的人了。文革几乎成为这“老五届”老同学聚会的永恒话题之一。在大字报栏前，几个同学抢去我正抄写的纸，在宿舍楼前立即召集了批斗大会，人群就像前向我们自发集会一样聚集起来，逼问我如何破坏文革运动，逼问为何上书中共中央。但系领导和政治辅导员们，正在楼上静静观战。批斗下来，辅导员就带人来宿舍监护了我，收走小刀、剪刀、指甲刀，我说：“郑老师，你少收了一件，刮胡刀片；台湾的刘自然中尉就是用它自杀的”。一年后、几年后、二十年后一直给我承认自己不是搞政治的郑老师，当时感到受了嘲笑，颤抖高叫“别相信他，他是一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别人遭遇如何我不知道，反正时时刻刻有两个专人看守我，无法自由行动。

原定7月中有横渡长江的活动、同学们早已准备了近一个月，由于“反右”，提前撤换了许多选手，包括我与我的许多熟人；但7月16日中午，渡江回来同学，带回来一个惊人的消息：毛主席检阅了游泳的武汉群众，毛主席横渡长江，王任重一起陪游。水院顿时轰动。毛主席就在武汉？他一定又住在对岸的东湖宾馆，他知道一水之隔的水利学院的情况吗？他会赞成水院这样整学生吗？

我们多希望王任重同志向他汇报武汉的真情啊！有的人拿出发下来才一两个月的毛主席语录本，哭着哼出了“红军战士想念毛主席”。这是1964年公演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一首名歌，学生把自己比作受王明路线打击的战士，而把毛泽东当作自己的救星和指路人。但批斗学生在继续，党委领导甚至亲自到会指挥。张弗承书记（权倾一时的院政治部主任，他直接组织、指挥了1966年水院的“50天”运动）就参加了6221班批判我的小会，并慷慨陈词。我主张用“23条”的精神和政策指导运动，不同意大字报无限上纲、无端指责，现在轮到自己来应付那时尚的指鹿为马了。不过，许多被组织起来参加批判的同学，他们向往革命，内心都是极其虔诚的，如果无端的指责允许我一一解释清楚，他们也难以继续指责下去；我想，你们就以我来锻炼干革命吧，我只是“风车妖魔”。每天，我在押送下浏览大字报、去食堂买饭。批判我的文章十分系统和理论化，一批一批的出笼，言辞之严峻锋利，使我想起批判胡风 and “九评”文章，也想起堂·吉珂德面对的“风车巨人”妖魔……

革命运动是把双刃剑，镇压群众的大字报有两种认识结果，文化革命和以前的运动不尽相同，从一开始就几乎具有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认识，舆论并非一律。一些人始终以为洋洋洒洒几万言的批判文章出自学生之手，而且全是真实揭发——甚至到1969年、1970年，还将66年7月的文论又变成材料送到我锻炼的部队、基层，有些人至今还天真的（？）赞扬那“50天”的运动“引导”——或许是断送了共产党政治文化的镇压；一些人反而同情受批学生，有人事后对我说“真是关心国家大事啊”，“你讲的不错”；1973年，河南一个15级的老县委副书记听了汇报水院追杀我的材料内容，反问“18岁的大学生给毛主席上书，提出要推翻政权自己成立什么共和国，当总理，那可能吗？就是给毛主席写信、想过当总理也不是反革命呀，今后他们一代总有人会当的”，“高等学校的运动就是这种水平”？拘禁当中，一天去食堂打饭，路上听见生活委员请示班长，“徐海亮的西瓜是不是不领了”，班长回道：“当然要领，他现在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个班长在1963年就看过我写给中共中央的信稿，而后来我从别人处听知，他压根就不同意整学生整我，作为班团支委，他被冷落，根本不让知晓“反右”的部署，尽管他此后并未造反，但一直是伸张正义、抨击邪恶的。两周的监禁是极其艰苦的，晚上入睡后，还有人用手电筒不断检查熟睡亦或装假，同学告诉我，那时的值班十分过细，连几时几分翻身、说梦话都留下记录；由于“反右”舆论过于恐怖，同宿舍有人竟怕我夜里去杀害他。由于天热，又缺乏行走活动，我的大腿内侧、阴部全都溃疡腐烂，到8、9月才掉下一大层厚厚的痂皮。7月30日，“反右”戛然而止。工作组副组长找我谈话，取消管制，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只要求去东湖游泳。一个与我睡上下铺的“中左”同学陪我下了水，对岸就是东湖宾馆……再远再远就是北京，我半个多月没能来了，只有靠清凉的湖水洗刷悲愤委屈和高热闷倦。后来才知道，毛泽东回京斥责北京的运动情况，王任重在北京见势不妙，急电省委打招

呼，学生中“反右”紧急刹车。8月中，在电影场听重要录音，突然听到了刘少奇的声音，印象最深的是，他用浓重的湘音说：你们问我——这个革命么子搞，老实说，我一也一不一晓得……。但8月上、中旬，谁也不知中央出了什么事。受了委屈的人——包括我认为，是院领导骗了省委，而省委又骗了党中央。从此对王任重产生失望和怀疑。王任重很快在中央文革失势了，他受到武汉学生的揪斗批判。但在文化革命之后，据说有人向他调查文革初大学生的所为；他说不要去追究了，学生也是上当的，何况造反派学生也保护过他。他成了“凡是派”，又确实有些历史污点记录，邓小平也无法用他了。回顾起来，1966年的5、6、7月，令我首次不是不断深究自己这、那，自以为非，而是怀疑党的具体领导，发现他们也可能作错、说错，乃至说假话，“我”可能属“是”。以前所谓的修正主义都在纸面上，这次，活生生在眼前。作为学生，我们不可能从概念上明白什么是修正主义，总是感性地把自已认为非共产党应有的东西，叱责为之。

（二）

8月19日，同宿舍的庞文海同学突然从外面回来告诉我，到下面去买报，毛主席检阅红卫兵，你会想看的！我好感谢他的消息与默契知心。庞是韶山人，一个很正派、稳重的同学，他自然不同意前段运动的走向作为，时常发些与众不同的高论。他后来就是6221班造反派的一个核心成员，如今在一个省直部门做技术老总。

8月23日，院广播台突然通知到体育馆集合，说是来了北京红卫兵！“红卫兵”当时还是生疏的新名词，但有莫大的吸引力，同学们飞奔而去，我觉得自己潜意识里好像去迎接陌生的天使一般。不过运动经过两个月，同学的分裂已不可避免，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左派（我们被视为“右”的人其实内心充满左的激情和自信），是保卫毛主席的；但一部份人认为党中央是要在干部群众中开展一次新的反右运动，另一部份人认为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决心向党内走资派斗争；一些人按照组织渠道的传达、布置来理解执行，另一些人按照自己本能的来理解来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我在一张大字报中曾经写道，现在是左右不分，左派、右派齐声反右。后来，工作组宣布撤离，成立院文化革命委员会。在此之前，进行了两天的大辩论，其焦点自然是前一段的大方向是否正确。人们主观上是“巴黎公社”大民主的，但当时的少数派声音很弱，占不了优势，多数人还不明白北京发生了什么，武汉与北京有什么联系。选举的结果，党委与工作队内定人选全部顺势当选，少数派提名获票不多。我自然是少数派，却盲目和无奈地在选票上划了勾。

新成立的院“文革委员会”重新抓住了“一斗二批三改革”的方向，推出一位12级的梁百辅副院长（抓后勤工作的）作为走资派，批判了一批老知识分子，斗争了1957年的老右派分子，八九月之际，组织了尚属较讲究政策的破“四旧”。一切都按部就班在进行，按省长张体学的讲法，“斗批改”在8、9月可以胜利结束，争取中秋、国庆“回家看嗯妈”！按“左派”们乐观的想法，我们这些铁定的“右派学生”大概很快就可以到“后期处理”了。但同时，一些人去北京看形势，其中一些于8月31日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回到学校，他们传抄了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央文件和北京大字报；我第一次读到“炮打司令部”，但还不敢真相信这就是毛泽东写的。这一批人于9月初组织了“831红卫兵”，这是水院第二个公开命名的造反派组织。之前，在6、7月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署名写大字报，8月里一直冲在前的同学，于8月28日组织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战斗队”，自作了队旗，开始批判工作队执行的政策。水院学生中的战斗队是自发出现的。6月初的大字报，多以个人、集体名义、班级名义签署，后因意见不一，自由组合的多了起来，开始有了小集体或个人的笔名；笔名具有战斗性挑战性，而且稳定下来，有了雏形的组织，到八九月后，形成了旗帜林立战斗队。不同的红卫兵组织，则是同类战斗队的聚合。水院多数派战斗队多用一些显示庞大、牢固、稳健、传统革命化的名称命名。少数派多用毛泽东诗词、语录中的名词成语以及斗争性、挑衅性的名词名句命名。文

化差异显而易见。水院里“多数派”、“少数派”的提法盛行于七八月间，到八九月，毛泽东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信，已经人人皆知，少数派渐渐成了自认和公认的造反派。当时，“院文革委员会”是合法的权力机构，各个组织都到院文革领取文具，开支必要款项。

9月初，水院造反派的几个战斗队，一次次到省委提意见、请愿、静坐和示威，适逢首都部份南下大学生炮轰省委，在省委门口、省委礼堂前，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发生辩论，焦点是湖北省委好，还是犯了错误。水院的造反派走向了社会，并与首都南下红卫兵接触，他们当时并未预料到，自己会在今后一两年，不断地影响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

9月底；由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安排，由水院院文革组织、全院绝大部分师生按正常班级建制到北京串联；而且在国庆节受到江青的接见（第四次检阅红卫兵），院文革的部份学生领袖，光荣地上了观礼台；为了保证国庆清晨的活动，据说有的同学幸运地住进中南海，甚至安排在周恩来总理的家里睡了一晚。到北京大串联，是水院多数学生思想发生变化的重要战役。特别在北京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这是多年来想都没敢想的最神圣时刻。那时，意想不到的是毛泽东对学生的高度信任和支持，使大家一下子从传统革命的崇拜者，成了现今革命的参与者、推动者；好多人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站在毛主席一边，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水利学院多数学生，来自农村和城市下中下层家庭，社会关系和政治熏陶不如北京学生。虽然6、7月有一些惊人的举动，少数人也非常过激，但与北京学生比起来，思想深处还是温和的。北京之行，使人大开眼界，多数人知道了党中央有两个司令部，听说了什么是路线斗争，渐渐地自觉去跟随毛泽东路线。毛泽东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造反派红卫兵从来没有感到和伟大领袖如此地靠近，从来没有这么自豪过。我与一些同学仍属于不可靠范畴，这批有组织的上京不予包括。记得当时在武汉，我的一个任务，是将做美工的同学在墙上已草描好的标语、语录，用油漆一一填上，闲时看看毛泽东选集，晚间在宁静的走廊里拉小提琴排遣。

10月6日，仍滞留在北京的我院部份造反派，去参加了一个重要的大会，即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第一次听到传达10月5日发出的中央军委《紧急指示》。指示中心思想是不允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给被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的人平反，材料当众销毁。

10月上旬，水院多数学生回院继续搞运动，一部份人开始了全国性的大串联和“长征”。

10月13日（或14日），省委工作队召开全院大会，贯彻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宣布给运动初期“反右”中被整的同学平反——销毁材料；但是，造反派坚决不同意由工作组执行的平反，坚持要彻底批判湖北省委执行的资反路线错误，要“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给自己恢复名誉”。我未去参加这个大会，只听见远远的喇叭叫我们一些人的名字，但半天没有回响，麦克风前主持者在小声说“人呢”？当初的材料，也已被复制转移，工作队的行动不了了之。但是，我班的团支书朱长荣同学（他是班上唯一的党员，后也选为院文革委员；现今也算厅局级干部了），在会后找我认真地谈了一次话，他坦诚地说自己在批判我的大字报上签字，参加对我批判，是错了，他很痛心，自己第一次参加政治运动就犯了错误，而且是“资产阶级反动”的错误。我相信他是十分诚恳的。他告诉我5月以来院系布置整我的一些细节，但是他也没有料到最后会抛出来公开批判，而且问题那样惊人；7月15日和后来几个重头大字报，其实不是学生写的，而是马列教研室的书记、64年开始在班上驻点的刘兴彬老师，以及他组织的马列教研室写的。刘老师当然是在党委指派下，撰写的居高临下的发难大字报，他此时已经是院运动的理论组主要成员，8月又选为院文革委员。刘老师会如此我一点也不奇怪，奇怪的是他之后一直泰然若是，关心我的前途，乃至我的家庭，好像问题、批斗就是同学造成的，好像一切谎言都

是真实的，一切意识形态的概括都是最后的判词。朱同学拿出时称的黑材料给我，我拒绝了，请他保留好，交给造反派看如何处理，造反派红卫兵正在收集、乃至抢夺这些材料；让运动来证明我的是非，如果材料问题成立，我心甘情愿去当右派。后续的历史说明，7月的大字报、材料，特别是它的思维病毒，衍生了好多代，对水院一代学生“穷寇”追杀不已，平反与否、销毁与否、退还与否真不一定解决问题。

“井冈山”兵团那时集中精力在为郭明正同志平反，我不清楚当时是如何通过省文革小组、省公安厅，带出了监狱里的郭，一起去了北京，又通过什么渠道，找到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副总理，谢听了汇报，说：你怎么会是反革命呢，我看就不像。这是谢富治第一次与水院发生直接关系。（郭同学现今是东北某设计院的院长、老总，在同学中始终享有不错的声誉）造反派则利用批判“资反路线”，宣传了北京、全国形势，争得了革命的人权、地位，团结了观望派（中间派不赞成整群众，也害怕整群众，但又不完全同意造反派中激进分子的言论、行动），为造反派形成水院的多数，作了思想和组织的准备。后来，以“横扫”战斗队为核心的少数派组成的“井冈山兵团”，加上“831兵团”、“红旗兵团”，与武汉大专院校其他造反派红卫兵先后分别定名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并于10月26日参加成立了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这就是后来称为的武汉“二司”。我院“横扫”队和“井冈山”的头头丁家显任副司令。他是一个普通农家子弟，三年级学生，个头不高。开始，保守派和观潮派都没把他放在眼里，决没想到，他会成为武汉朝野挥之不去的人物。所谓“一司”，由各院校“文革委”组织的大专院校红卫兵组成，后来被认为是保守派红卫兵。

10月的水院，对造反派采说，仍如节日的狂欢，每天都有新鲜事件出现，造反派自己装的广播，每天都播出理直气壮，时时又带着冷嘲热讽的批判文章。好多年后，一些外地来过水院的大学生，还给我提起造反派就像在播送“九评”一样的起劲。走进造反派集聚的6号教学楼——革命造反楼，我觉得自己像走进了法国历次革命中的巴黎市府，或十月革命时的斯摩尔尼宫，有同学感到6号楼的大阶梯教室，好像当年法国各派争吵的“国民议会”。几年后，我研读法国大革命，20多年后，去了彼得堡，终于明白当年的臆想决非偶然。

不管怎么说，1966年10月在水利学院是关键。院团委的主要干部，是院党委一手培养出来的骨干，他们和一批政工干部、政治辅导员，反对党委如此对待学生群众，造反参加了少数派的活动。他们也成了一批核心人物。我是在11月中去北京的。听说毛主席接见到月中就会停止，我赶快去车站排队办票，可是只有11月22号以后的，再早已经发完。怎么办？我当时见识太少，不敢无票上车、扒车，一狠心买了广州来车车票。车票全价22元，是我一个多月的生活费，我天真地想，国家已经花了不少钱了，自己也花些吧。不料临到上车时，不叫进站。问讯处好心告诉我车站里面乃至路轨上人太多，武昌临时不停车，已经绕外线直奔汉口了，要有决心，就赶到汉口。我没有钱再去买票了，决心坐电车去赶。大概火车这段路是20分钟，电车再快也要40分钟。好在汉口站也是人山人海，列车被略略耽搁了一点，还开着门停在第一道，而检票员也仅仅让我这自费者冲进去，刚上车车就开动了。在北京我有一个多月机会，走访了二十几个著名大学，中央各部，北京市委、团中央、中央党校、学部，拜访了他们的各派组织，和不期而遇的四川、上海、福建、内蒙、黑龙江等地学生交流，也参加了许多会议。我从小小的一个3千人的水院，知道了全国，北京流行着“天大地大没有党的恩情大……河深海深没有阶级友爱深”的乐曲，是毛的路线，一下子将天南地北的学生、工人拉近。在北京有两次使我泪如泉涌。一次参加全国造反派“批判资反路线大会”，呼和浩特大学生把一个小学生带来大会发言，小孩说：学校把我打成小反革命，因为我给校长写了一张大字报，当时我才9岁……武汉的眼泪在这里我才真正涌出来了。另一次，我专门去看望干外婆张金保，她是大革命时武汉的工人领袖，六大中央委员，曾被王明停止党的生活，她自费买枪打游击，从湖北打到山西，直到“七大”时，毛泽东亲自为她平反，还风趣地说，“喔子搞的罗，王明把知识分子打成反革命，怎么你这个工人也打成反革命了”。我们见面时，中央10月工作会议的精神

正在向下传达，张外婆十分了解学校里出了什么事；她开口就讲党内斗争的历史，讲不要怕党内斗争，也不要怕王任重，“王明都斗了，王任重算老几？”我说王还讲要“秋后算账”呢，她像40年前在汉口大街讲演一样滔滔不绝：“自盘古开天，哪朝哪代哪个阶级见过自己掌了权还号召革命的？只有无产阶级、只有共产党，也只有毛主席能作到！……只有毛主席最了解你们青年人，你放心，只要毛主席还在，你们就吃不了亏……毛主席不在了，就难说了……”一席话说的我热泪滚滚而下。她没有谈及院长张如屏，其实他们当年一个是中南水利部长，一个是女工部长。

11月26号，由解放军组织，我们清晨5点就起床，走到西苑机场，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乘军用吉普车，在下午检阅了机场的大、中学生。我被解放军排长安排在最后面，因为个子高点，横队约有100米的宽度，我距车队还不算太远。后来有报导说红卫兵欢喜雀跃，其实非得跳起来才能看见。排长那天发给我一枚毛主席像章，一厘米多的直径，很普通的也很精美，至今还在我的盒子里。对于我，北京的串联日子也是非常关键的，我开始领悟什么是政治大革命；北京的生活是极其丰富的，我收集了许多、看到许多。后来在业务工作中习惯于南下北上，访东问西，总是从66年就开始的。

12月20日回到武汉，造反派正批判院领导。我们的老院长，第一书记张如屏，是黄埔前期学生，老革命，8级干部，运动以前，学生们都很尊敬他，听说他是1957年与那时的右派分子针锋相对斗争的英雄。在学生中“反右”的秘密动员，是他搞的，造反派狠狠批判他，但似乎并不恨他。一次，有人用十分漂亮的对仗和书法，贴在他住宅小院门口一幅对联，横批竟是“真他妈的”，庞同学和我讲起这种蛮不讲理和老辈人难以忍受的对联，哈哈大笑。我大概与那些无忧无虑和义愤填膺的同学不同，自忖在戏看周回，一些非原则的仇气，包括两派喇叭播送的攻击对方——几近中学顽童的对抗举止行径，常常叫人忍俊不住。我曾经写信给张院长举例，说苏联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当年在少年教养院，曾被院长误认为偷了糖，他向院长保证，请他相信自己的清白，院长不信；马特洛索夫逃出了教养院浪迹社会；第二天一个小女孩向院长认错，院长彻夜未眠，深感到作为教育者，自己第一次犯了不可原谅韵错误。我说，幸亏马特路索夫没有因此堕落，他还成了用胸膛堵住敌人枪跟的英雄。但为什么一个教育者不理解不信任自己的学生呢，“为什么先生老是欺负学生呢”？您难道不后悔吗？……

张院长从何时后悔的，我无从知道。1967年夏初，武汉武斗初起，水院学生受到殴打，学生在汉口、武昌绝食抗议时，他捐出了自己的薪金和粮票，而且拿着老脸去找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上将，请部队出面来制止武斗、保护学生。老革命、老院长终于和学生站在了一起。水院学生，那时还是很简单的，他们衷心希望这场革命，不是分离两代人，而是使两代人衔接得更紧。他们十分希望一个个老干部，都站出来支持自己。他后来与刘真、毛远跃（测绘学院院长、第一书记；据说是毛泽东本家侄儿），以及水院的梁副院长，其他几个干部，组成了革命干部联络会（革干联），公开支持武汉造反派。1967年“三结合”时，被结合成水院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但在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后，一度被打成“叛徒”、“5.16黑后台”。70年代中，通过一些他的老领导（说是王首道）作工作，他被平反。我曾去看望他，他给我讲了很多。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他从不恨红卫兵，红卫兵是想革命，他也并不记恨他一手培养出来，后来（在学生毕业走后）又批斗他的一些政工干部。他想不通的是他的某些上级领导——省委的领导，是多年的干部，党的历史、政策都懂的，为什么要挑起群众斗干部？我明白，他指的是抛出延安审干时已作结论的材料，置他于死地的一些恶劣作法。1969年后，水院的干部大批挨整，据说执行“林彪路线”的军宣队，居然宣布水院干部只剩下“一个半好人”，那一个好人，竟是运动初众矢之的——后又装傻躺下的原党委宣传部长！在他积极参与下，老干部统统打成“走资派、叛徒、黑手”，有的甚至被“推荐枪毙”！相比之下，他们应当理解1966年确实是错怪错整了一大批纯真激情的青年学生。而工作队成员，卷入了运动初斗争的中心，最早受到学生冲击与影响，我与时时听候批判的李组长聊天，他心平气和，也是心悦诚服地认为

自己作错了，我觉得他是诚恳的，也觉得不能怪他什么；上级指示他，水院向他反映，他必须照办。67年初，我也与刘真队长平等、诚恳交谈，他参加过多次造反派的批判会，参加过陪斗，他开始了解水院造反派并不是那么青面獠牙，他也认为自己的确作错了。我当时提醒他的一点是，水院的“反右”，不仅仅路线上完全错了，而且一些关键人物的关键问题，恰恰是假的，这是他和一大批虔诚的“反右”积极分子始料未及的。他从1967年初开始支持水院造反派，后来被打成黑手，由于和造反派接近，文革中、后期他与其他几位省委秘书长一样，始终站不出来。

水院造反如滚雪球一样，由小变大；先后组成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兵团”、“八·三一兵团”、“红旗兵团”，我所在的班“抗大战队”属于“红旗兵团”，但在北京我总感到自己实质上还仅仅是一个观潮者，我比我的同学们，早了几年来盼望一场革命运动，为此我读了好多，也写了好多。但文化革命真正来了，我以为落后的同学好像比我更为激进。我认识的好些同学，成为著名的造反战士，而且不乏《水浒》中梁山好汉式的人物。11月，从正统的大专院校红卫兵中造反出来一大批人，组成了红卫兵革命造反兵团，也加入了武汉二司；其头头是一位院文革委员，是运动以前知名的院三好学生。到此时，我认识的老院文革成员，已有五、六人加入了造反派，我们年级的第一位党员，还毅然参加了“横扫”战斗队。另外有一大批主张批判“资反路线”，又不同意二司一些激进的言行的人，组成了“共产主义红卫兵”，参加了武汉红卫兵第三司令部。

到1966年底，我院造反派以二司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为核心，占领了院广播台，元旦后，又封了档案室，接管院政治部、武装部、保卫科的权力，实现院内夺权，对外代表武汉水院。对立的保守派红卫兵组织迅速瓦解，许多人外出“长征”串联，一些人留校冷静观察。到此时，水院属于武汉二司的红卫兵，及其影响的外围学生，大致已经占全院三千学生的一半左右。

第一稿 1995年6月 补充于 2003年6月

□ 本文为《我的大学生活》之四，原文写于1995年，辑入《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今重新扫描成电子版，并略作修补。

~~~~~

【史海钩沉】

三审王光美

• 清华大学《井冈山》报 •

（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召开30万人的批斗王光美大会。是日清晨，清华大学红卫兵驱车入中南海把王光美押到清华园主楼七层的一间会议室里。王光美一进来，数十名红卫兵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并伴以一阵阵高声质问。因为王光美陪同刘少奇访问印度尼西亚时穿过旗袍，戴过项练，被定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红卫兵强迫王光美穿上显然瘦得不能穿的旗袍，套上用乒乓球特制成的一串“项练”在批斗会上亮相。当王光美被押上会场时人群哗然。从北京各处赶来参加大会的人争相拥看王光美。批斗会结束后，“红代会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井冈山》小报出了专刊，登载了一篇《三审王光美》的文章。以下是这篇文章的部份摘录。——编者）

◇ 第一次审问

地点：清华中央主楼。

时间：1967年4月10日晨6点半左右。

问：刘少奇为什么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

答：我从来没有听少奇同志讲过这个片子是爱国主义的。少奇同志肯定没有讲过。我相信毛主席，毛主席总会调查清楚的。

（同学们要她穿上去印尼的衣服斗，王光美不干。）

问：这衣服你一定要穿上！

王：就不穿！

问：穿也得穿，不穿也得穿。

王：反正我不穿。

问：告诉你，今天是斗你。不老实，小心点。

王：我们好好谈谈好不好？

问：谁跟你谈？告诉你，今天是斗争你。

王：反正你们不能侵犯我的人身自由。

问：（哄堂大笑）你是三反分子老婆、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别说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也不给，半点也不给。今天，是对你专政，没有你的自由。

王：这是绸子的，太冷了。

问：“冻死苍蝇未足奇。”

王：如果我真的反毛主席，那冻死就活该。

问：你就是反对毛主席。

王：我现在不反，将来也不反。

问：不行！都穿上。

王：你们没有这种权利。

问：我们就有这个权利！今天是斗争你，我们要怎么斗就怎么斗，没有你的自由。你那套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臭理论收起来吧。我们是革命群众，你是反革命臭婆娘，你混淆不了阶级阵线。

（时间到，捉鬼队员给王光美穿妖衣。）

王：你们武斗。你们违反毛主席指示。（众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王：谁反对毛主席指示就……（被打断。）（众念：“顽固分子，实际上是顽而不固……”）

王：你们用强制手段。

问：胡扯！是你侮辱我们。你穿上这套衣服去印尼与苏加诺吊膀子，丢尽了中国人民的脸，你侮辱了全中国人民。你还想倒打一耙？对你这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清华园的头号大扒手，对你就是要强制。

王：希望你们好好调查一下。

问：我问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谁干的？

王：真正的革命者是勇敢的，是勇于正视事实的。……反正“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肯定不是我，也不会是扬天放。谁是真革命的，谁干的谁自己承认。是谁说清华园是黑窝的，是谁说宁可怀疑99个也不放过一个黑帮……真正的革命者就要敢于站出来，谁干的谁自己承认。

问：你说，为什么打击基层干部？而何东昌倒在香山休养，刘冰、胡健在北京饭店，蒋南翔，同学们提了多少回，你们就是不斗。

王：问我不知道，北京饭店是在开会。蒋南翔的情况我是反映了，中央有同志批示（我不能说是谁）不让拉回来斗。

问：派工作组的目的是什么？

王：同意派工作组是当时中央常委会决定。当然毛主席不在，刘少奇在负主要责任。但真正他派的，只有我一个人。

问：就你一个人就打多少革命群众成反革命？害了多少人？

王：我们没有定一个反革命。

问：你赖不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事实。

王：事实总是事实，应该根据事实得出结论，这才是毛泽东思想。

问：不对。立场是主要的。你们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就是看革命群众的阴暗面，反对文化大革命。我们看的事实，收集到的事实就是和你不同。

王：现在有人推卸责任……。如果是真正的革命左派应敢于承认事实。怀疑一切是错误的，是谁提出的？

问：你们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革命群众干部。

王：反正“怀疑一切”不是我的思想，更不是刘少奇的思想，我们是反对怀疑一切的。

问：（气急、骂）大扒手、反动资产阶级分子，给中国人民丢脸！揭事实。（给苏加诺点烟）

王：我认为我没丢脸。那天是告别宴会，他坐在我旁边，我是女主人……应尊重印尼习惯。

问：你说，你把多少同学打成反革命。我们这里就有不少。

王：我们只批过，没有打成反革命。

问：谁让你反“假左派”的？

王：不是刘少奇。是工作组问我，是叶林，扬天放，他们说蒯大富写了一个夺权的批语，还有反映了与现在根本不同的片面情况，我就根据这些同意了。

问：刘少奇做了什么指示？

王：刘少奇对清华的指示很少。

问：那你卖菜是谁让干的？捞政治资本。

王：那是毛主席对刘少奇说：“王光美为什么过去四清时‘三同’，现在不‘三同’啦？”主席说：“可以参加劳动，这样可以接受批评。”我听了很感动，就去劳动了。

问：那你老老实实劳动啊！为什么三个饭厅去卖菜？

王：走三个饭厅，不是因为接触面更广吗？

问：你回答：“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到底是谁推广的？

王：的确不是刘少奇。

问：蒯大富是谁定的反革命？

王：与刘少奇无关，也肯定没定反革命。

问：你交待，保蒋南翔是谁指示的？

王：蒋南翔性质未定的话是我讲的。但你们前后的话都不讲，只讲这句是断章取义。

问：同学们对蒋恨死了，你却说性质未定，不让斗，这不是保他是什么？你知道不知道？

王：我不知道。你们试试看，将来你们的工作中不要犯错误。

问：你对批判《修养》怎么看？

王：这本书是唯心的，不谈阶级斗争。我同意报上发表的《红旗》评论员文章的几句话。至于反毛泽东思想，主观上我是不同意，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

问：你对戚本禹同志批《清宫秘史》的文章怎么看？

王：这部片子是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的，戚本禹同志批得很深很对，这部片子刘少奇没有说是爱国主义的。我和他一起看的，当时只看了一半，以后天亮了看不清了，他什么也没说。这是肯定的，他没说过。我和他一起看的，我知道肯定没说过。

问：照你这么说戚本禹同志在造谣了？

王：是不是另外有人假借刘少奇的名义说过这些话？

问：你觉得这篇文章说得对不对？这是毛主席看过的！

王：是吗？毛主席看过的吗？我觉得还是从革命利益出发，从事实出发，如实向毛主席汇报情况。

问：戚本禹同志文章针对的谁你清楚吗？

王：那他提的的确是刘少奇。

问：你对戚本禹同志提出的问题怎么看？

王：有的是刘少奇的责任，有的不是刘少奇讲的。

问：那么《红旗》上在造谣？刘少奇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王：相信毛主席，相信群众，过去就是相信不够才犯了错误。我在刘少奇身边工作了十几年，我觉得有出入，反正有许多不是刘少奇的事。说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直接没感到这一点。

问：那叫叛徒集团自首是怎么说的？

王：这不是他指示的，是一个负责同志提议他同意过的。

问：是谁？

王：我不说。

问：你包庇！快说。

王：（沉思一会）是柯庆施建议的，刘少奇同意的了。

问：（气愤）不许你污蔑柯老！

王：反正我说话你们不相信，你们可以去调查好了。

问：王光美你说，你对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怎么看？

王：我主观上还认识不到这个水平。反正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主席许多事情委托刘少奇、书记处处理，发生的事他要负责，但现在他靠边站了，不负责了，不当权了。在反动路线时他是走过一段资本主义道路的。

问：就是反动路线这一点？

王：当然不止。凡是犯路线错误都走资本主义一段道路。

问：就按你的这种说法，你说说看，刘少奇走过那些资本主义道路？

王：山西老区互助组的批示，是错的，是他批的。合作社发展太快，他求稳，说要慢一点。1962年他对困难的估计过份。“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谬论他是不赞成的，单干也是不赞成的。他那时许多时刻还是坚持社会主义的。

问：刘少奇宣扬“红色资本家”，说剥削好，也是主观上走社会主义道路吗？

王：刘少奇是讲了很多错话，你们是指他1950年在天津的讲话，当时我也在，我知道的，有许多话是很错误的。当时天津有一种过“左”情绪，不少人要消灭剥削阶级，是毛主席派他去纠偏的，他一些话是纠偏讲的。现在大字报上的话与他讲的有出入。

问：这么讲，说“工人就得剥削”是对吗？

王：有些是错的。有的这样讲是对的，有的这样讲不好。这不能脱离环境。比如一个资本家与他座谈，说剥削是罪恶，那开一个工厂就大罪，再开一个工厂罪就更大了。刘少奇说只要对国富民强有好处，开厂剥削，这样的剥削是需要的。工人也需要这样的剥削。这是在特定条件下讲的，现在有人砍头去尾地讲这句话。

问：那鼓吹和平民主新阶段，散布对蒋介石的迷信是谁呢？

王：那不只他一个人。根据报纸上的报导，绝不是一个人的责任，停战协定（决议）上写“和平、民主”很明显嘛。他现在把责任担起来，勇于承担责任。（众笑：这么他还是英雄了？就是勇于承担责任吗？）

问：那你说，还有谁？

王：不用说了吧？

问：不行！迷信蒋介石的人要查出来。

王：我是中央工作人员，要保密。你们可以去查查报纸，有公开文章的！

问：那刘少奇贪污金皮带圈、金鞋拔呢？

王：金皮带圈、金鞋拔子是有这么回事。他做白区工作，随时有被逮捕危险，是应该身上带些东西的。

问：“红色资本家”是谁提的？

王：不知道！反正不是刘少奇，他只说进步资本家。

问：你是否说过王光英这个大资本家好，还要拉他入党？

王：王光英不是大资本家，最多是中产阶级，民族资本家。他剥削是剥削，可是……你们可以调查一下，他是否可以起进步资本家的作用。他不愿当资本家，说资本家名声太臭，要求入党，党给他任务，让他做资本家的工作。

问：你现在对刘少奇怎么看？

王：说他一辈子反革命，不反资本主义，我没有充份材料。

（同学们要她戴上项练。）

问：你说！江青同志叫你出国不要戴项练，你为什么非要戴上？

王：江青同志是要我不要带别针，没说戴项练的事，但问题是一样的。

问：那你说红旗调查员的文章怎么样？

王：红旗调查员的文章……（不语。同学吵，逼后，大声嘶叫。）有很大的片面性。

问：好，记下来。

王：记就记，我说的，怕什么！“怀疑一切”肯定不是工作组搞的，更不是刘少奇搞的。清华，我们的问题肯定是右倾主义，是路线错误，我们是右倾不是形“左”实右。反正这“怀疑一切”不是工作组搞的，我没有这个思想，刘少奇也没有这个思想。

问：那你说是谁？

王：反正有人。

问：无耻！蒙骗人家还夸耀。现在谁都看透你这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本质了。

王：我不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我是毛主席的共产党员。真理就是真理，可能是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

问：你敢否定革命小将？

王：真正的爱护小将，应该是什么就说什么，不能歪曲事实来爱护革命小将……（被打断。众：你放毒！）如果你们摆事实讲道理，就让我把话说完。毛主席说：坏话，好话，反对的话都要听，要让人把话说完，你们要不摆事实不讲道理，那我不讲了，你们斗吧！

问：我们就是要斗你这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清华园的大扒手。

王：我不是。我是共产党员。

问：你不要给我们的党脸上抹黑了。干的丑事不少啦！桃园四清你干了些什么？

王：对四清材料你们了解多少？你们都找什么人了解？你们下去五天，我待上一年了，比你们了解，你们要认真调查。

问：去你的。桃园经验臭透了。一会儿你听听。

王：桃园经验是好的，不是坏的。但有缺点有错误。

问：（大伙耻笑她）有功，有功。那么“后十条”看来也是好的，有缺点、有错误吧？

王：“后十条”是刘少奇改的，有些清规戒律，但精神是好的，是毛主席叫他改的。

问：这么说“后十条”棒极了？

王：“后十条”有好的部份，但有形而上学，繁琐哲学，一些政策界线强调得过多，成了清规戒律，束缚了群众运动。

（群众气极，给她打扮后照相。）

王：谢谢你们。你们不应该侮辱我。

问：刘少奇是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你认为怎么样？

王：（避而不答）他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六、七月份是他干的，但以后就不能归他。

问：归谁？你说！

王：他路线错误有影响，不能全归他，他有责任。

问：蒯大富反革命案很久翻不过来，谁负责？

王：蒯大富反革命不是刘少奇定的，刘少奇没跟我说过蒯大富是反革命。

问：他在《修养》中大骂有人要全党尊重他……是指谁？

王：那是什么时候出版的？他不是骂主席，那是指洛甫。

问：那1962年再版时为什么不修改？反而把斯大林都删了？

王：那不知道。他是坚决反修的。他改的地方有档案在，你们有条件就去查。毛主席说要出“刘选”，他不积极，后成立编辑委员会，要他修改出书，他看过一遍，有的是编辑委员会改的，他

没注意，你们可以去查嘛。我知道，他是不反斯大林的，“九评”，“两论”，他都参加起草的。

问：戚本禹同志的文章你怎么看？

王：批这电影很对，该批。

问：不对，要害是揭开了“老革命”的画皮，暴露了假革命、反革命的本质。

王：“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问：胡说！你顽固到底死路一条。我们就是要把刘少奇拉下马！

王：拉下马我同意，别人领导比他对党更有利。

问：王光美，你对戚本禹同志提出的几个问题怎么看？（念戚本禹文章最后几个问题。）

王：一，没讲过。我不知道。（指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疯狂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猖狂反对毛主席三个问题。）二，我等待毛主席讲话，等毛主席讲最后一句话。刘少奇并不是梦寐以求资本主义，他想搞社会主义的，说猖狂复辟不是那样，愿意搞社会主义的。他特别谈了防修、反修、反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他经常想，但想不出办法，无办法，没有水平，无魄力象毛主席那样搞文化大革命。他是考虑避免修正主义复辟的。我认为他最大的错误是没有提倡全党全民学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地位、重要性、毛主席对他的信任来看，应很早就提出的，但他一九六六年才提出，这是他最大的错误。三，他没有反对毛主席，更没有什么猖狂。他有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地方，有不少是世界观问题。四，他没有大肆宣扬。他是想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当时白区损失极大，日本人又要进攻，因为一些人不知名，影响又不大，就让他们自首了。北京61人，天津几十个人。至于自首书的措词，什么“坚决反共”，他不知道的。五，起草的文件，中央是看过的，当然他要检讨，但同一个文件他提出过积极练兵。当时这些是可能造成不好的影响。六，他反对资本主义改造？没有！在天津讲话是错误的，但改造资本家他是积极赞成的。合作社问题他是同意过一些同志的意见，主要是邓子恢干的。七，八大报告有缺点。但是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八大决议好像也有错误。……主席没看过？……这是很匆忙的，刘少奇决议好像也看得很匆忙。不过文件出来很久了，毛主席、党中央未表态。八，这不是刘少奇说的。他只是对困难估计过份了。可能是会助长歪风滋长。九，刘选编委会叫他审查的，他对此不积极。十，他是过份强调了阶级斗争，过份强调了扎根串连。有些话使人感到农村漆黑一团。十一，对六、七月份之前我同意毛主席大字报的观点。六、七月份后他也要负责。是不是都要他负责，那我就了解情况了。

（王光美准备坐牢，将毛巾、牙刷……什么都带来了。）

问：王光美，你怕不怕？

王：我怕什么？我不怕。

## ◇ 第二次审问

时间：4月10日下午1点

地点：清华主楼803

问：你对戚本禹同志的文章怎么看？

王：戚本禹同志文章写得很好，旗帜鲜明。根据我所知道的事实，刘少奇是假革命、反革命的结论我得不出。1950年我同刘少奇一起去看这部电影时，他没有讲什么。主席说要批判，他没批判，这是错了。反正我没有听他说过这部片子是爱国主义的。戚本禹同志文章出来后，我很气愤，也很关心。毛主席说要我们关心国家大事么。我又问了刘少奇一次，与他回忆了很久，他也说没说过。我们相信毛主席，伟大的毛主席会弄清楚的。

问：照你这么说刘少奇还是老革命？文化革命也只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王：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不是偶然的，他自己也说不是偶然的，他的世界观没有根本改变，不可能不违背毛泽东思想，他是要负主要责任。他没有毛主席的胆量和魄力来发动领导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过去，我的错误是相信党、相信毛主席不够，相信群众不够。现

在，我愿意交真心给你们。我对“假革命”、反革命的确没有认识到。

问：问你，你对今天斗争大会怎么看？

王：今天大会表现了群众的愤怒。我个人受一些委屈也没啥。毛主席教导我们也要经风雨见世面嘛。我希望你们给我录音，我听得太少了，我应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也应让刘少奇知道。

问：狡辩！我问你，桃园经验到底怎么样？

王：我认为桃园经验是成绩多缺点少。

问：嗨，还成绩呢！你倒成了有功之臣了。

王：成绩不是王光美的，是毛主席的，是毛泽东思想的。

问：不许你污蔑毛主席。

王：我去桃园，许多人都不支持。刘少奇是主张我去的，那时就只有毛主席支持我去。

问：可是你呢，大整社员，大整同学，毛主席支持吗？

王：那，人的认识有个过程，这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然正确的思想从哪里来？

问：再问你，刘少奇在天津讲的反动话你怎么看？

王：天津讲话，有好的，有不好的，有错误的。他是毛主席派去的，是针对一些人“左”倾情绪去纠正的，他说的话有些是很不好的。但“红色资本家”不是他讲的，我知道，我不说是谁。刘少奇只讲过进步资本家，资本家是有先进的，落后的。

问：谁说的“红色资本家”？

王：我是中央工作人员，要保密。

问：不行！你是专政对象，说！

王：还是不说的好。我知道你们要揪。

问：算了吧，谁不知刘少奇是老机会主义者。

王：是的，是有人批评他老右倾，立三路线时批评他右倾，王明路线时也批评他右倾……（打断）

问：恶毒！你说现在是什么路线？不许赖！

王：我是说过去。

问：你对《论修养》怎么看？

王：我同意红旗评论员的话。

问：戚本禹同志的文章呢？

王：（避而不答）

问：赶快交待你和刘少奇攻击中央文革的罪行。

王：刘少奇没有罪行，叫我交待什么？

问：少耍赖！你对中央文革到底怎么看？

王：越是做工作多的，缺点错误是不可避免的。真正的革命者要自我批评，中央文革是经常检讨自己的工作的，我从讲话上看到过。大字报上边也有提意见的嘛。

问：三反分子的臭老婆，我们早定你……（被打断）

王：中国的妇女中国的女共产党员是独立的，不能因为丈夫错了，老婆就一定错，老婆错了丈夫就一定错。

问：你们俩本来就是臭味相投，你是什么共产党员？你是刘少奇拉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

王：我入党不是拉进来的，我有手续的。

问：你介绍人是谁？

王：反正不是徐冰，外面是谣言。

问：谁？

王：一个姓孙，一个姓赖。

问：叫什么名字？在哪儿工作？

王：（不说）我的历史，我全部向组织汇报过了，你们可以通过组织调查，这些没必要说。

问：我们就要你说！谁看你档案。说，刘少奇对戚本禹同志文章怎么看？



王：文章发表后，他很仔细地看了两遍，我想他不会承认假革命，反革命。刘少奇说他从来说过是爱国的。我们一起回忆过这件事，那回是谁推荐的，什么过程，我都忘了，反正是演到一半天就亮了，看不清，我们什么也没说。

问：你是不是说戚本禹同志，《红旗》在造谣？

王：戚本禹，我一直认为是好同志。是不是有人造谣，我不知道。反正刘少奇没说过。

### ◇ 第三次审问

时间：4月10日5点40分—10点5分

地点：主楼803

问：刘少奇是反党头子，知道吗？

王：毛主席十一中全会上没有这么说。十七年来成绩是毛主席的，刘少奇是第一线，有错误是他的。

问：你说《红旗》文章你同意，那刘少奇是否修正主义那一套？

王：《论修养》是唯心的还可以，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等，我想不通。

问：《修养》和赫鲁晓夫是否一样？

王：有某些方面一样，也有合乎马列主义的。

问：哈！这不是修正主义吗！打着红旗反红旗，你自己回答这个问题。1962年大量印出版是谁定的？

王：可以查么，不是刘少奇亲自抓的，不知道。

问：戚本禹文章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王：从批《清宫秘史》和肃清刘少奇影响是好得很，但有些事实我有保留。是假革命反革命我还未认识到。刘少奇从来没讲过是爱国主义。

问：难道《红旗》文章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吗？

王：我不知道毛主席亲自看过。

问：你相信不相信中央文革？

王：中央文革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总的说来相信的，每个成员是否都相信，那我有保留。……

问：戚本禹文章的结论是中央文革的，你拥护中央文革吗？

王：那为什么不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发表呢？

问：刘少奇看了戚本禹文章什么态度？

王：反正，刘少奇不是反革命。

……

~~~~~

【当事者说】

这回真要和你分别了

• 王光美 •

处在震天撼地席卷中国的风暴中心，少奇的名字竟被作为一切罪恶的代名词。无数诽谤、侮辱都加在他身上，无限的信任霎时变成“刻骨仇恨”，人妖颠倒，忠奸不分，是非混淆，真伪莫辩。少奇的痛心难以言喻。

有一次他说：“我过去常对你们讲，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今天，

我还得加一句话，就是对一个人来说，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说到这里，他的声音颤抖了。1967年，“一月夺权”之后，各地党组织全部瘫痪，政局混乱，生产停滞，武斗开始发展起来，许多无辜的生命倒在血泊中。少奇的焦虑日甚一日。

一天，他似乎在自言自语：“这样下去不行，我是不是该给主席写封信呢？国家要毁了，这不是搞马列主义，这是行不通的。”

我接过他的话：“愈是行不通，你的罪过愈大，你不能再说了。”
“可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这个坚定而响亮的声音，震动着我的心。

两天以后，少奇同志直接向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他的两项要求：

“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身处漩涡中心的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

冬去春来，已是花放叶萌之季，我们家里依然像严冬。4月里的一天，他说：“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样不严肃过。我早在去年8月的会议上就讲过‘五不怕’，如果这些人光明正大，可以辩论嘛！在中央委员会辩论，在人民群众中辩论嘛！我还要为国家、人民，为我们党和广大干部讲几句话！”

入夏黄昏，我问少奇同志，为什么你我都被描绘得那么丑恶，简直成了罪犯，可彼此却没有怨言呢？少奇同志说：“因为相互信任。”我当时心情很激动，因为这是指政治上的信任。在工作上，多年来总是他教导我该做什么和怎样去做，就像一位耐心而严厉的教师对一个小学生。我做错事时，他不留情地批评；做对时，他只表示同意，或只点点头，很少听到几句表扬的话，有几次他说过：“在工作上，老婆的话应少听，党内早有教训。”听到这话，我的自尊心真有些受不了，就说：“我也是一个党员嘛。”其实，我心里一直敬爱他，从没有奢望他也给我以同样程度的信任。而在共同的苦难和战斗中，少奇同志说出了“相互信任”。我是多么珍视他这句话的含义呀！

1967年7月18日早上，平平 and 源源匆匆跑来，告诉我们：“今天在中南海里再次开批斗大会，批斗爸爸和妈妈。”当时，正是百万人“围攻中南海，揪斗刘少奇”的高潮。形势的确严峻，我们预感到分别的时刻已经来临，今后我们将要各自单独奋斗了。此时，我只对他说了句：“这回真要和你分别了！”就怎么也忍不住，眼泪流了下来……

傍晚，我完全平静下来，等着来人揪斗了。少奇同志生平惟一的一次为我打点行装，拿出我的衣服放好，整整齐齐。在最后的几分钟，我们面对面地坐着，谁说革命战士没有温情脉脉？没有儿女情长？这时，不爱说笑的少奇同志，却说：倒像等着上花轿的样子。我不禁想起他说过的的一句话：“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是为大多数人民谋幸福的，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他的无私无畏感染了我，我也跟着他笑起来。

“王光美！”进来的人一声吼叫，打断了我们的笑声。我站了起来，少奇同志也站了起来，我们握了一下手，他又用深情的目光看着我，轻声对我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 据《炎黄春秋》

~~~~~  
【文献资料】

九大毛泽东主持会议记录稿（之一）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1969年4月1日下午5时正式开幕的。秘密状态一直开到4月23日下午结束。接着开九届一中全会。同日结束。——编者〕

◇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下午五时

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今天要选举大会主席团，通过大会议事日程。大会议事日程主要包括三项：林彪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第二项，修改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三项，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现在选举主席团。要不要读？你们都知道了嘛。主席团这么多人，一百七十六名，行不行呀？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有董必武、刘伯承这些人；有于会咏、王体、王震这些人。一共一百七十六人。你们手上都有，赞不赞成？赞成的举手。（全体代表举手）多数吧？通过了。（总理：请当选主席团成员上来。）大会主席团要推选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再选一个秘书长。哪几个当合适呀？我看林彪同志当主席。（总理：毛主席当合适。）（林副主席：毛主席当主席，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鼓掌）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个副主席，好不好？（林副主席站起来说：不好！不好！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主席万岁！赞成的举手。）（全体举手一致通过）（林副主席：好！全体通过。）

一定要我当主席也可以。我提议林彪同志当副主席，同不同意？赞成的请举手。（一致举手）没有意见，通过。谁当秘书长呀？我提议周恩来同志当主席团秘书长。好不好？（鼓掌通过）

我希望我们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能开得好，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从一九二一年到现在，我们已有四十年的历史。这么长的时间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董老，还有人不认识吧？（董老站起来）再一个就是我，其他好几个牺牲了，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武汉的陈潭秋，湖南的何叔衡，上海的李汉俊，都牺牲了。叛变的、当汉奸的有四个：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这两个人还活着，张国焘到加拿大去了，刘仁静在北京，是个托派，见过托洛茨基。另一个李达，武汉大学的校长，早二年去世了。那时全部党员只有几十个人，六七十个人，大都是知识分子，后头就发展了。从那一个时候发展到现在这种情况。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三次、第四次，人都很少，几十个人。第五次是在武汉开的，人多一些，可能有百把人。第六次是在莫斯科开的，几十个人。（总理：还有刘伯承同志。）第七次是在延安开的，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清算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错误路线，特别是王明路线。那时党内有分歧。有人提议，不选王明路线的人到中央。我不同意，说服大家选了他们。结果有几个人不好，王明跑到国外去了，反对我们，不好！张闻天不好！李立三不好！李维汉不好！（总理：还有王稼祥。）王稼祥犯了错误。其他几个，刘少奇、薄一波、安子文这些人，那时不知道不好。对他们政治历史我们不清楚，也选进来了。从“八大”以来，现在搞清楚了。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比较清楚了。因此，希望我们这次大会能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开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胜利？我认为是可以的。开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是可以的。庆祝党的这次大会的胜利！

现在请林彪同志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

（林彪同志作了政治报告以后）

同志们，今天开会开到这里，明天分组讨论，请你们发表修改意见。

散会！

◇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一日下午五时至六时半

（首先对李雪峰同志说）北京有人攻你了吧？北京攻得厉害呀，多少次检查也不放，检讨一下就行了。为什么检讨那么多？到天津又有人攻，是山西发动的，他是山西人啊。（总理：给刘格平打了个招呼，是张日清他们搞的。）（张春桥：是刘芝兰、陈叔中搞的。）

找同志们来，想商量一些事。这个会就是开小会开下去，还是开一次大会？我们谈过一次大会，然后再开小会。我想开一次大会，通过政治报告、党章。但还不发表，文字修改交秘书处。这个政治报告增加几段，一个是民主党派，一个是统一战线。共分八段，每段加个题目。明后天，今天是十一号，十二、十三讨论两天，十四号开大会。此外，看是不是这样。我看到一份简报，北京市的一个简报，说清理阶级队伍有一个倾向，就是扩大化。这个问题在碰头会上谈过好几次了，清理阶级队伍要把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现行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找出来，要搞这一些人。有些地方搞得好，有些地方扩大化，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由中央提出要搞，一搞他们就扩大化了，历史上也有不少这种事。比如延安整风，开始时是为了召开“七大”，事先把问题搞清楚。搞清楚了，不在大会上批评那些犯错误的人，我讲开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结果是团结起来了，是胜利了嘛。不仅是土地革命时期三次“左”倾，瞿秋白、李立三、王明。我说是难免的，既与他决裂（指第一次国共合作），于是“左”起来。四中全会康老是有研究的，王明反李立三，说是三中全会搞得还不够，不是反他们的“左”是反他们的右。一次比一次厉害点，李立三比瞿秋白厉害，王明比李立三厉害，把红军搞得差不多了，就舒服点了。抗日时，王明回国又右了，他们说红军光中央苏区就有五十万，他们不是打日本，不是依靠群众，是依靠国民党。我们说主要是抗日。民族矛盾加深了。国内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总有一个主要矛盾，结果掩盖了另一个矛盾，……发生了皖南事变，一个事件有一个主要倾向，如打日本，民族，统一战线掩盖了独立自主，掩盖了阶级矛盾。后来批判了王明，现在有人说整风不应该那么整，整错了。我说将来还有人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还在世，既然合作，就放在合作上去了。他们和我们口号也是一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独立自主不能说没有，不然就不能发展那么大。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主要是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东东边是海陆丰，西边是广宁，广西是东兰，韦国清来了没有？（总理：没有。）到后来，一天天地突出出来了，到蒋介石杀人前夜，没有想到搞根据地这个问题呀，我看请大家酝酿一下。蒋介石杀人把掩盖的一面就突出出来了，拿枪干起来了。同国民党干起来了，而刘少奇就在武汉交枪，别处也有。有的打了一仗打败了。上海“四·一二”事变，那时不知道到乡村去，到乡村也是敌人叫我们去的。因为城市杀人，既然打起来就一齐打倒，××农不在其列。民族资产阶级不分什么资本家、工商业、小资本家都打倒，所谓民主，民主革命是一句空话。我们说民族资本家不搞合作，内战犯了三次“左”倾错误，为什么“左”呢？不是说要打吗？所以表现形式呀总是“左”。到了抗日第二次合作，就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掩盖了独立自主，搞根据地，扩大红军发动群众，直到日本投降。日本投降以后，开头国民党请我去谈判，没有结果就回来了。然后就是董老、总理你们去了。写了协议应该算数嘛！我在重庆时有人在延安搞了个“和平民主新阶段”。（董老：我们在重庆不知道。）（曾思玉：晋察冀是聂荣臻传达的。）东北没传达。（林副主席：

我们在东北没有传达，发了个电报给中央。这个电报就是说现在不是“和平民主新阶段”，而是内战期间。是同刘少奇对抗，反对刘少奇的。）“七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因为把蒋介石打败了嘛！我们进城以后，那个时候把刘少奇，把刘、邓团结起来了。除邓小平没有发现历史问题以外，另外，薄一波、安子文等都和国民党有一些关系。也有一些人是跟着走的，不一定是叛徒、特务问题。例如山东的谭启龙，算这类。共和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就开始了，但我们没有宣布，土改以后才逐步宣布。土地改革彻底？就不那么彻底。有的是和平土改。至于对民族资产阶级利用、限制、消灭它。（张春桥：利用、限制、改造。）在几年内，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已经指出了，但是没有经常讲，所以广大干部不知道，所以这一次又来了二次革命，叫文化大革命。是从文化开始的，叫不叫大革命？以后历史学家去做。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名称叫什么都可以。主要是对上层建筑，机关、学校、工厂，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恐怕还要一个时期要认真抓一下。当个革命委员会主任不容易，我这个主任也管不了那么多。（姚文元：主席是全国革命委员会主任。）我也算一个主任。比如北京还不是谢富治、温玉成去管，与过去不同是可以插手了。（谢富治：主要是靠主席抓的。）（林副主席：主要抓了典型。）（张春桥：陶铸抓了生产，不叫抓革命。）工厂、农村，六六年十月、十二月发了两个文件，现在还是要搞。一个工厂、一个农村、一个机关、一个学校，部队也搞了嘛。（黄永胜：搞了。）可是要谨慎啊。有些专案组的材料不一定准确，南口专案组八个人搞一个党委书记，要注意，搞专案的人总想多搞几个好。过去我们行军，没事捉虱子，总想多捉几个，专案组好像捉虱子，要超出，超出一点好说话。我这个人没搞专案，就可以说，搞了的人就不好说话。一个大学捉了九百多人，怎么得了？人关起来了，捉有捉的理由，放更要有个理。（春桥同志讲上海关的人数。）我看不止一个上海，其他地方都有。至于关在牛棚里的人更不少，恐怕各地都有。上海关的人干什么？（春桥同志：在扫地。）苏联人讲我们整知识分子，秦始皇杀了四百几十个人，我们还没有杀一个人吧，是关牛棚。（康老：苏联红星报上登了彭真坐喷气式的照片。）喷气式不要搞。我说罪魁祸首还是我；我在十二中全会上讲了，说：我在一九二七年文章上说了，地主戴高帽子游乡，既然给地主可以戴，为什么不可以给彭真戴？给彭真××（听不清）牛鬼蛇神戴，我们几十年没有搞了，这次红卫兵就翻出来了，坐喷气式。三反五反时天津就搞过，我们不主张戴高帽子，搞这一套。抓人还是大部不抓，抓了怎么办？还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嘛！别的想不到了，现在扩大化了，许多同志要注意。想到我们党的历史，总是个主要倾向掩盖之下，另外一种倾向就忽略了。我讲的就是这点。完了。（停一会儿）报告通过了，也不要公布，文字修改交秘书处；会后再公布。（康老：主席早就说过，工作同睡觉，吃饭同大便，在延安时就讲过，一个时候总有一个。）在延安没有讲。（康老：诸如主席是讲辩证法，要有一个过程，我们是吃饭多于大便，像小孩吃奶一样，一面吃一面拉屎。）（大家笑）我们行军拉屎挖坑，也有自己挖坑的。（总理：我们犯错误，就没想到挖坑。）（许世友：到营房以后，就不挖了。）营房把我军与工农隔离了，不是好事情，当然不搞一点也不好，老百姓也讨厌，所以专门搞个营房总不好。什么是三支两军呀？人家看不懂。（林副主席：要写全称。）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三民主义我还记得，五权宪法我就背不下来了。（总理：还有三反、五反。）（张春桥：五反也记不得了。）那你们去开会好不好？（张春桥：十四日发公报。）（姚文元：公报不要搞太长了。）（总理：比上次要长一点。）十四日基本通过，下一步搞选举。这个比例范围，人选还是过去的办法，小组提议，还是大组提议？（总理：还是小组提议。）但是，我提议几位老同志，就是你们讲的几个老机会主义，都选进去。我开幕讲话就有这个意见。王明、李立三、张闻天、王稼祥，“七大”时不选他们，也是作了工作，才选进去的，张闻天在遵义会议是同我合作的，以后也是好事作得多嘛！

王明回国以后，他们没有站在王明方面，是站在我们这边的。这次能不能把张闻天、王稼祥选进去，再考虑。几位老师，李先念、李富春要选。（许世友：应当选。）王明他们（江青：王明不同。）有几个反动派有什么要紧！（许世友：他们反了几十年，选进去了，他们还是要反，怎么办？）我们就永远准备他反。（许世友：主席下命令就选。）那不就成了命令主义。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嘛；朱德、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要选进去。（董老：几个老师

选进去是可能的，张闻天、王稼祥要选进去有困难。)(康老：王明说他们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哪一年传播过，一不做工人运动，二不做农民运动，三不会打仗。张闻天、王稼祥还做过。(下面问李雪峰)李雪峰同志，你们小组有多少人呢？(答：六十几个。三结合五个，地方五十五个。)(问郑维山同志)你们不在一起呀？军队怎么开会呀？多少人呀？(答：军队另编一组，三十二个人。)(问张国华同志)现在没有人反你了吧！还有人打倒你吗？原来要打倒你这个土皇帝的，西藏叫他土皇帝，也来了嘛！所以不要认为反对过你的人都不好。武斗全国都斗不过四川，至于清华、北大，不算数，它那里双方都有一万多人，有电台指挥，真枪真炮。(张国华：有几百部电台。)从什么地方搞的？(张国华：有从学校的，有搞来的。)我们过去搞演习是假的，这次真枪真炮我看是个训练。

(未完待续)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吕青（加拿大）     | 熊波（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